

中国高层决策

六十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创新

第一卷

范希春 主编

京华出版社

范希春 主编

中国高层决策六十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创新

(第1卷)

(1949—1976)

尤国珍 胡国胜 占华林 穆瑞 编著

范希春 辛向阳 审定

京华出版社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高层决策六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创新.第1卷/尤国珍等编著.-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724-790-6

I. ①中… II. ①尤…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7326 号

中国高层决策六十年

范希春 主编

著 者 尤国珍 等编著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010)64243832 84241642(发行部) 64258473(传真)

(010)64255036 (邮购、零售)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编辑部)

E-mail: jinghuafaxing@sina.com

印 刷 科普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字 数 1200 千字

印 张 72.8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24-790-6

定 价 150.00 元(全四册)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一脉相承 与时俱进

——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与发展战略 (代序)

范希春

社会主义,既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也不是个别天才人物的奇思妙想,而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必然选择。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与发展,雄辩地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科学性与真理性。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封闭半封闭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的时代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历史主题。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国家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发展问题的理论探索和战略思考也随之在不断深化,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不断创新,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选择,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导向性的决定作用。

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理论与发展战略

1. 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与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初步设想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未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3 版,第 777 页。

来的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应该共同繁荣和发展。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将起决定作用，新民主主义社会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国内主要矛盾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应该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必须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引导占主要成分的个体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了未来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以及建国后各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分为序言、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7章60条，具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国家根本大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①这就是当时临时宪法对中国发展问题作出的根本规定。

应该说，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层关于中国发展的具体思路一直是沿着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来展开的，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在五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的条件下，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稳步进入社会主义。为此，1951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发展思路。

2.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

从1952年9月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经过近一年的酝酿，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比较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完整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在 10 到 15 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为“一化三改”），会议讨论和正式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 年 2 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的总任务，写进了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至此，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为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纲。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完成国家工业化，建立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二是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农业、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私营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所有制。工业化建设是主体，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当时简称为“一体两翼”。其实质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基础；目的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这是一个经济建设与所有制变更、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同时进行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中国后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过渡时期总路线，实际上包含了两个过渡的设想，即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过渡；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开展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完成，使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确立，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制度保证，中国从此开始步入社会主义社会。

过渡时期总路线还确立了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应该说，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确立，是由中国工业化发

展的实际水平来决定的。当时，中国的工业十分落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仅有的一点工业基本上集中在沿海城市和地区，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设备极其缺乏。这种落后的状况，只有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迅速改变。只有大力发展战略性基础工业，增加机器制造业的原料，轻工业的装备才有保障；只有大力发展能源和交通运输业，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正常运转；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实现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建国初期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必然选择。因此，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确定，实现工业化，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必须实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环节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七年，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成就是巨大的。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

“一五”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但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也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仿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对于保证重点建设的顺利进行、当时市场的稳定、人民生活的改善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农轻重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关系等涉及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重大问题，已开始困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

1.《论十大关系》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发展理论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讲《论十大关系》，吸取苏联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训，提出了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构想。在这一讲演中，毛泽东提出了统筹“十大关系”的问题，即统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前五个问题集中在经济方面，后五个问题

集中在政治方面,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等关系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在讲演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①毛泽东提出的要处理好国内、国外的十大关系,已经涉及到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内容,其根本意义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思考,试图突破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走出中国发展的新路。以苏联为鉴,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但又比较系统的思路。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针对中央集权过多的弊病,提出了打破苏联大一统模式。这主要表现为:其一是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一种维护全国整体利益前提下,各个地方展示其多样性、适合本地特点、各显其能的生动活泼的建设局面。其二是提倡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②“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③强调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经过国家计划调节,“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④这与苏联牺牲农业、忽视轻工业发展,过度重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是迥然有别的。

毛泽东的上述重要论断和思想,在承认矛盾的普遍性的前提下,强调了矛盾对立面的共存、共生、协调发展的统一性和必然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对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经济社会统筹发展问题作出的科学思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这一探索的意义在于，明确提出了试图超越苏联高度中央集权模式的现代工业化发展道路，又超越西方以高资本、资源投入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化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东方农业大国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

2. 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与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目标的确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为大会致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新形势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及时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的八大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方针的确定，对于保证国民经济稳步前进具有重大的意义。党的八大还作出了初步改进政治、经济体制的正确决策。决定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

财政的管理权限，并且注意改进和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同时规定，保证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主权力。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党的八大最突出的贡献包括了四个方面。一是从理论上正确地阐明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二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战略转变。三是提出把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的战略发展目标。四是系统提出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制定的经济建设、国家政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执政党的建设等方面正确方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未能全面坚持下去。

3.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与国民经济调整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届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确定其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具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合理性，有正确的一面；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在实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过度地强调了人的主观积极性，忽视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脱离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其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成绩，使其向纵深发展；以少量的投资来充实一些部

门的生产能力，使其成龙配套，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的“八字方针”，表明国民经济已由“大跃进”逐步转向调整阶段。到 1965 年初，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4. 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确立

1953 年，毛泽东在修改、审定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提出了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问题；1957 年，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现代化的问题；1959 年，毛泽东再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① 根据毛泽东的设想，1963 年 9 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64 年 12 月 21 日至 1965 年 1 月 4 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正式确定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8 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其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介绍了中国过去的经济进步，阐述了未来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重申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用 15 年的时间，即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 20 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并强调，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必须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精神。

应该说，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符合中国现实发展要求的，为中国未来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对中国经济社会

^①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6 页。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与发展战略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战略决策，即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一决策，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关于经济工作，全会提出，要实行三个转变，即：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从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转到按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与集中很好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从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外资，大胆进入国际市场。这是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开端，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和战略决策的重大转变。

1.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

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认为会出现一个新的和平时期，但对世界形势的基本判断仍然是，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这一判断一直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理念、发展决策和发展战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这一重大判断。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概括了当今世界的两大突出问题，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①并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②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思想中最为集中和突出的内容，这一主题的确立，成为中国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基点。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2.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发展理论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致开幕词中指出，我国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胡耀邦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着重阐明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施纲领，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是：1981年到本世纪末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在战略步骤上要分两步走，即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报告强调，为实现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把党的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中共十二大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党胜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标志着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始。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发展理论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规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纲领。

在邓小平关于发展的思想中，经济的发展是第一位的。他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①“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①“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②在邓小平看来,经济建设是一个关乎现代化“大局”的问题,甚至提高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③邓小平一再强调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长期的工作中心,从根本上抓住了中国发展的关键。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一重大的政治问题: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所建设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非资本主义或其它社会性质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四项基本原则,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现代化建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才能顺利实现。

对外开放,可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争取必要的外部条件和巨大的推动力量,这是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一科学的结论,是邓小平整个改革开放思想的重要基点。中国要发展,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从70年代后期起,邓小平反复强调,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开放,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⑤邓小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17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234页。

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国情出发，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从而科学地说明了坚持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3.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理论与小康社会目标（“三步走”战略）的提出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课题，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邓小平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了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并且强调，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奋斗目标，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同时也包含着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目标之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而形成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邓小平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出发，明确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他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 页。

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①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说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正确的思想价值导向和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必要的智力支持,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基本指导方针、根本任务等作了规定。阐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

邓小平还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联系在一起,在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②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只是物质经济的现代化,而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在内的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保证和支持。

邓小平发展理论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把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发展目标定义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科学论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最为关心的问题,他曾经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同富裕。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①“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②“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类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③为了解决发展中出现的两极分化问题，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发展目标。

1979年12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和目标——小康，对此，邓小平的表述是：“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④

邓小平在集中全党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和目标。1984年10月，邓小平提出：“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

^①《邓小平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页。

^②《邓小平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1357页。

^③《邓小平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